罗瑞卿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报告

1950.10.19

（记录稿，未经本人审阅）

这个会议就要结束了，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很好，很及时，很切合时宜，根据当前形势需要，给我们工作上以很大支持。少奇同志的讲话又将中央指示的根据与方针，给我们以全面的深刻的指示，以会议上同志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，有些问题我已经讲过了，所以这个总结要谈的就不多了，仅就某些具 体问题，再提一些

（一）反对外国反革命。所谓外国反革命就是指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。我想重复的说，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，必须重视这个问题，这是个高干会，同志们都是高级干部，你们一定地深刻懂得少奇同志所指示的，除军队而外，整个中国归我们公安机关统治，外国反革命归我们来办。但是我看大家对此问题还是不够重视的，其中固然也有原因，如怕犯错误，盲目的害怕，对外国反革命最好少沾边，免得犯错误，这种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的思想情绪支配了某些同志。历史原因也有，既过去农村斗争，不习于此，入城之后和我们直接作斗争的大量反革命还是国民党特务，使我们感到把手脚占住了，誊不出手来，对帝国主义特务对我们的危害，脑子里的反应比较抽 象，正因为接触的少、研究的少、了解的少，所以就感到办法不多，从大会发言中可以看到，我们反对外国反革命的办法还是不多的。今后就要更多的接触这个问题，知识是可以学到的，经验是可以积累的，不要盲目的害怕，要钻进去，不要怕犯错误，要敢于同外国反革命作斗争，否则我们就会要犯大错误；小的错误是难免的，即使犯点错误，也可以在这方面锻炼我们，当然要力争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。下面同志的经验比我们更差一些，敌人的技术和经验，则比我们更要高明，困难是存在的，但一定要搞，要战胜敌人。那么为什么应该重视这个问题？因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，已成为我们主要的敌人，治安会、经济会、侦察会，各次会议 我都讲了这个问题，事实如此，绝非夸大，他是特务匪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国民党特务残余都已成为帝国主义特务的附庸。关于这点毛主席在三中会全上就曾指出，所有一切特务匪徒，“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”，显然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，国民党特务残余很好整倒，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，我们要想整倒他就比较困难一些。再就是从目前情况出发，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，特务活动已成为其战争布置的重要组成部份，可以看到敌人对我们更接近了，甚至已经同我们短兵相接了，我们不仅要起而应战，还要准备进攻，所以再不重视就要吃 亏。我们本事虽然不大，但可以好好学到本事，共产党办事有许多是开头不懂以后就什么都学到了。帝国主义厉害，但有许多弱点，我有困难，帝国主义也有许多困难，虽然我们还不熟悉，但也要同敌人打仗。

要重视，要反对外国反革命，就要迅速准备许多必要的条件，特别是各大城市、交通要道、海港边防的公安机关，更应如此。比如懂外国语的人，我们尚无此条件，即可着手找一些，他如技术人员、情报、材料、档案等，都要准备，要有一批干部专门掌管研究这个问题，要加强学习，每破一案，要很好总结经验，加以研究，提高 自己。应该承认对于外国反革命我们脑子里还很空，不象对国民党特务那样熟悉，如究竟是什么系统？究

竟是什么组织？往往搞不清楚。一句话，要求领导同志重视 起来，要在这一方面，下一番功夫，更多的学习，把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战斗力提高一步。帝国主义是很凶恶很狡猾的敌人，不重视，不学习，不提高自己。我们就会赶不上形势的需要。当然，整外国反革命也还要留点根，也不要以为这次“赶”了就不再来了，他还是要来的，这是个长期斗争。

目前要做的，就是将有证据的逮捕起来，没有证据的找证据。“关”还是“赶”要看情况，究竟“关”那些？也还要请示中央研究考虑。总之要看必需和可能，所谓必需就是情况的必需战争的必需，如东北、青岛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以及西南等地区，均有此必需。所谓可能，就是要看我们的力量和当地实际情况。还要有步骤，有外交关系者和没有外交关系者，要有所区别，先整帝国主义反革命，首先是先整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各地潜藏的纳粹分子等。问题不是很简单的，须要认真分析研 究，比如东北和四野有大批日本人，由于日本长期侵略中国，至今散布在各地的日本人也还不少，其中包括一部份技术人员，如医生、技师、工程师等，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这些日本人、朝鲜浪人、白俄、纳粹法西斯及其他无国籍的外国人；庐山一地即有十七个国家的外国人。情况是很复杂的，所以究竟具体地怎样搞？搞那些人？凡是有此问题的地区，请你们按照中央方针，作好工作计划，送来中央批准。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情况材料，而且地区情况各有不同，所以目前中公部尚 难作出统一计划。至于对外国反革命是否杀头的问题，上次报告中我已经讲过，还是不杀为好，不仅国际惯例一般如此，且因我们在外面也还有许多人，我们要杀，他会报复，我们不应该先打第一枪，不要使世界老百姓感到我们排外，反给人以口实。

这里要联系谈到教会问题。教会里也有外国人，但教会是群众问题，是世界群众问题。少奇同志讲过了，这是个长期的斗争，所以要稳、要慎重，不要急燥。我们既定 的方针，就是派人进去，派人去信教，去当牧师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可派一些去信教。教会中也有进步分子，要争取他们，团结他们。教会可以办，但要中国自己 的来办，要提倡“三自”，“自传、自治、自养”。这个工作要有人，要花钱，但这是必需的，请你们回去同党委商量，要搞这方面的工作，说服我们的党员，要诚心诚意的去信教，要钻进去，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以至 若干年，其任务就是要把教会的领导权逐渐篡夺过来。这是个麻烦，是个政治斗争，也是思想斗争，我们要慢慢摸索这一工作的经验。我们对教会问题要慎重，对教会中的外国反革命，确实拿到证据，也要整一下，如过去我们整过的献

县天主堂间谍案，如最近北京发现有的天主教堂给反革命掩藏枪支子弹，也应该整一下，总之我们整的是外国反革命，要与教会问题分开，同时必须取得证据。当然也还要看当地-实际情况，如某些地区外国人所办的学校、医院等，我们条件不具备，则不要急于干涉，否则群众会埋怨?我们。又如华南同志反映，该区群众反美情绪很低，怕外国人，这要靠我们作宣传、作工作，同时也要看到“整”外国人，可以教育群众，当群众真正看到我们有力量有办法整掉外国反革命的时候，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情绪，必然会更加提高起来。

（二）对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的正确了解。我也想再来说明一下。中央指示之所以镇压，不是强调宽大，少奇同志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指示，根据我的了解，其理由：一、反革命还是很多，不是很少，镇压反革命是消灭反革命阶级的具体手段之一。我们要加强专政，如毛主席所说的，“只准他们规规矩矩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”。 二、时局需要，美帝国主义在我们门口烧起战火来了，在我内部存在着他们的一些内应，我们把房子

打扫清楚，更好对付帝国主义。三、反对反革命时机已经成熟，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，特务活动猖狂，人民要求镇压反革命正是这样。四、“宽大无边”的右倾偏向，从总的来看确实存在，如有的没有镇压或很少镇压，有的镇压而 不及时，群众埋怨我们宽大无边，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之宽大，认为我软弱可欺，甚至以此威胁我之干部。如上所述，我们对中央指示，必须坚决执行，不能丝毫动摇。

我们不仅要坚决执行，更要准确执行。就是说要搞的很准，如北京等地提出的口号：“又狠、又准、又稳”，这是很好的，但其中决定的东西是“准”，只要“准”才能有 “狠”有 “稳”，不准也就谈不到 “狠”和 “稳”。 不要简单的盲目的强调多杀几个人，这样是很危险的，不能讲越多越好。有人在征粮征税中，凑数字，犯了单纯任务观点，这是错误的，但如果杀反革命也要凑数，那就更加错误；杀反革命不能讲交人头交的越多越好。我们的任务和政策是一致的，不在于杀的多少，而在于该杀的是否杀了，该办的是否办了。错杀多杀是很危险的，喜欢我们这样的，只有反革命。同时要加强侦察工作，取得证据，不要轻信口供，反对逼供信，更坚决反对运用肉刑，这一点是我们长期肃反斗争中的宝贵经验，切不可忘记。少奇同志指示我们，“左也要怕，右也要怕”，杀人搞大本营了是可怕的，必须深刻领会。过去我们在延安整风审干时，毛主席规定了九条方针， 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 “一个不杀”，故在当时工作中，虽然某种偏向，但未能造成更大损失；因为只要人头不落地即使搞错了，”摘掉帽子，陪个不是“就行了，如错杀了人，则无法挽救。所以对于搞左了的，乱打乱杀，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态度，立即停止，甚至对当事人予以撤职，然后再说搞通思想。对于杀人权的问题，有的 同志提议扩大一点，放到县团级去，我看还是不要如此，因为一扩大了就有危险。

其次，必须把中央指示与地区情况相结合。如对少数民族众多地区，一般的不适用此指示，不搞好就会损害了工作。由於我党正确的政策，对于少数民族的工作，我们已经开始收到不少成绩，国庆节那天，全国各少数民族代表团、歌舞团，云集首都，老百姓称之为“万邦来朝”， 空前未有，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亲密团结的新气象，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所梦想不到的。所以我们执行反对反革命的具体政策要与总的政策路线相连贯，要与地区情况 结合的好，在少数民族地区要特别慎重，杀一个人也要慎重。再即在反革命气焰不是很高的地方，过去镇压已经不是很少的地方，执行政策中也须慎重考虑，不能一般要求。至于个别地区所发生的乱打乱杀现象，更必须坚决制止。

上面所说:这样慎重，是不是把应该强调的镇压一面冲淡了呢？我看是不会的，相反的我们是为了更正确的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指示。

（三）几个具体问题：

一、清理积案与具体执行问题。各地要按照情况，迅速清理积案，纠正久压不问与镇压不及时的现象。但对于关起来的反革命与现行犯比较来说，如果力量不能兼顾，则以先办后者为宜，尽先处理新破案件，关起来的索性再等一等，如东北最近所破获之破坏铁路的、破坏桥梁的反革命案件，应该先办，以求及时。河北武安暴动事件亦应先办并多办几个。 他们的运气很好，赶上了我们的风头，这些都是坚决的反革命，正如少奇同志所指出的，胜利前后反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，经过解放，经过宽大，他还作反革命！ “不教而诛”固然是不对的，但教而不改亦不杀，更是不对，不“杀一”就不能 “儆百”，对这样的反革命，不办则已，一办就要狠。所以要着重杀现在正在活动的反革命，要先办他们，”后来者居上“。

二、“杀、关、管”三字。对反革命专政，三者缺一不可。目前有些地区放松了管制，是不好的，不管则可能造成多杀，要纠正不管，也要纠正管的不好，如有的打击面过宽，结果反而管不过来，有的张冠李戴管错了人，有的形式主义，天天要反省报告，甚至拉屎拉尿也要汇报，这是不好的。“管”就是政府管制，（经过分局、派出所执行），同时要发动群众二者不可缺一。登记对反革命是很大的压力，可以暴露敌人，可以挤出敌人，“管”亦包括强迫教育，这是较长期的一件工作，甚至要管他几年，慢慢取消。望各地对此有经验者，写一总结，报告中公部，以资推广。

三、会门问题。会门是大量性普遍性的东西，这是想要同我们作斗争的最大的反革命组织，东北已打垮，华北已取缔，但潜伏势力仍然存在，一遇机会，即可再起， 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，一律依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办理，对会道门进行正面进攻。老区条件已成熟，即可开始进行，新区条件不同，暂不要慌，可先搞头子。

四、对谣言问题。总起来有三个字“讲、驳、追”，“讲”就是对谣言加以驳斥，有什么谣言就驳什么谣言，“追”就是追谣言的来源和根子，搞的好可以追出特务。前二者大家都做，我要配合，后者则主要是我们公安部门的任务。

五、对老区土匪。目前尚未肃清，要坚决搞到底，东北经验很好，可以推广。老区土匪，一般的都带有政治性，没有好人，要关起来不释放。对於惯匪武装匪特，国民党地下军以及倒算反攻的地主，都应该杀掉一些。有的同志认为老区土匪有不少是经济性的，名之曰“经济土匪”，这是不妥当的，因为解放后还当土匪，杀害人民，反对我们，即使同反革命还没有直接联系，也是反革命性的，故不能宽宥。为把土匪彻底剿灭，公安部队拟于今冬派出若干部队，协助各地。

六、散官散枪。对流散各地的国民党官员，其办法是安置、管制，与镇压首恶相结合。能够安置一些，对其余的人是会有影响的，不老实则管制，反革命则镇压。对 散枪问题，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，总之不要心急，要看具体情况，这个问题基本上要等到土改之后才能解决，对埋藏的反革命武器可以搞出，对企图暴动或聚众暴乱 者可以缴械，四川所谓“枪换肩“的办法，是完全对的。

七、纯洁内部问题。对我之心脏地带，一定要搞纯洁，如政治保卫、经济保卫、侦探部门及所有领导者不纯是不行的，对于一般的部门，非机要部门，如果目前来不 及的话，还可以缓办。有点皮肤病如疥癣之类，是容易治疗的，如果心腹大患则为严重问题，甚至如负责同志之秘书、警卫员、保姆等，因为他们接近心脏地带，所 以也须搞清楚。

八、与法院关系问题。拟再行研究发一指示。监狱要准备接收。特别法庭、审判委员会，根据当地情况需要与可能，可以组织，军管会形式亦应采用；不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，均以达到简化手续，镇压及时，不出乱子为目的。

九、军队工作。在起义部队中，海、空军人员中应该加强工作。个别老部队近亦有发生问题者，亦应引起注意。军队与地方关系问题，双方应很好配合，地方可以要 求帮助，军队不能拒绝，尤其是在边防海口地带，更应配合密切，军队、地方何者为主，要看情况。海港问题，尚难解决，应加紧调查研究，弄清情况，再来解决。

十、经费、武装、干部。经费不足，可以根据需要造好明年预算，困难可以提出，但须讲明理由，报告上级，基本上要靠各级党委来解决。武装不足，可以建议党委 在扩充地方武装时补足之，干部问题，基本上应靠各地逐渐培养自力更生解决。此次会后，拟将这三个问题请示报告中央、主席。

十一、计划、报告、宣传。各地都要做出计划，送交中公部审查。报告，过去一般的不够好，有的很少报告，或报告而不及时，有的报告较多，但太乱太杂。写情报应有具体材料，并说明材料来源及可靠程度如何，应有分析研究，“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”，不要有文必录，使人难于看出问题，可多用电报形式，既精练，又及时。宣传问题很重要，各地都要搞起来。展览会的方式很好，京、津都搞过，收效很大，既能向群众报告工作，又能宣传教育群众，各地均可采用。中公部今后还要办全国公安展览，请各地注意及此，供给材料。

十二、党委领导问题。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。公安部就是社会部。公安部又是政府的，又是党委的。公安部门不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不接受党委的领导是危险的。事实证明，那个地方党委对公安部门领导的好、公安部门接受领导好，工作就做的好，反之则工作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。